

北海珠海路旧事录述

周德叶

北海有三条东西走向的百年老街，它们分别叫沙脊街、中山路和珠海路。其中，珠海路临街立面的建筑，因具有中西建筑风格糅合的特色而闻名遐迩。

本文重点介绍珠海路。但介绍珠海路不能不介绍它的前身——大街，而大街的建成及其建筑风格又与沙脊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珠海路，首先从介绍有北海第一街之称的沙脊街开始。

沙脊街往昔

沙脊街（今北海市民建一街）约始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距今已有180多年历史，是北海市区最早的街道，故有北海第一街之称。此街全长400余米，东西走向，建在形呈脊椎隆起的沙带上而得名。

沙脊街只有两米多宽，路面全用花岗石条或其它石条铺砌。街上南北相向的店铺全为一层或两层的建筑。临街立面除墙柱外，全为木板结构。瓦檐伸出约一米，起着遮阳避雨的作用，保持着我国南方商居两用建筑的传统形式。

沙脊街始建时从老地名“九曲巷”处自西往东兴建，它的代表性建筑是广府商人于清末建造的广州会馆（旧址为今五小），该馆占地面积颇大（即今五小校舍的面积）。馆内建筑有若干个厅、堂、厢房和天井，具有我国南方古典建筑的特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州会馆是北海市区近代建造规模最为宏大的民间传统的公共建筑。该馆的两个慈善机构——广仁社和太和医局都设在馆内，后来又设立消防队和敬和小学（今五小的前身）。由此可见广州会馆的建立，对当时北海的慈善公益、文化教育以及医疗消防等方面的贡献甚多。商业方面，较有名的店铺有荣昌隆洋杂批发专卖店和广成、卜远成杂货铺。其中的广成杂货铺历史悠久，它的前身可追溯到清末民初，而它的黄金时代则在1937年抗战以前。该铺是“前店后厂”的双铺头。那时北海通用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北海人叫“铜仙”），到该铺购货的顾客很多，真是“客似云来”，售货员接过顾客购物的铜币后，为节省时间，直接把铜币扔到柜台后面的地上，待晚上收市关门后才把满地的铜币

检起来，其生意的兴旺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广成杂货铺经营的相当一部分是自产的本地货的话，那么荣昌隆经营的则是从广州、香港或澳门购进的“来路货”，如唱机、铁钉、自行车、缝纫机、布料、家电、娱乐用品等，是北海当时最大最兴旺的一间洋杂百货批发零售店。此外，还有数间客栈、货栈和当铺。宜仙楼、珠浦楼和流芳斋均为当时的茶楼酒馆，其中宜仙楼为一连6间两层的酒楼，有北海第一酒楼之称。在这间百年酒楼临街的墙柱上，老字号“宜仙楼”招牌还清晰可见；东西两面屋檐下的墙壁，分别书写“高等旅店，招待士商”和“宜仙酒楼，茗茶点心，中西饼食，蜜饯糖果”的广告字迹至今还隐约可辨。由于商业的兴旺，在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1930—1936年），广东省银行在沙脊街租用广州会馆开设“广东省银行北海分行”，取代先前由私人开设的“银号”，以扩大北海的货币流通。

街头的“九曲巷”是烟花女出没的地方，是人人皆知的“名”巷。烟馆（鸦片烟）和赌馆也充斥于此街。警察局、电报局、电灯局、税所（专收屠宰生猪税，昔日称“猪捐”）以及爱群医院都设在这条街。沙脊街成为北海早期的商业、行政中心。

沙脊街建成后，接着在其东端往东兴建长270米的中华街。此街的商业也很兴旺，有文化、饮食、鞋业、手工业和故衣业（买卖旧衣物的行业）。清末民初，北海著名的秀才包国修在此街开了一间“蔚华书店”，是北海市区的第一间书店，对北海的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文化的发展，高连升笔铺（专卖各种规格的毛笔）生意兴隆。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手工业也应运而生，如鞋作坊有复信昌、履信昌、步步娇。金铺有德成、天生；打银铺有耀兴、坤顺等。周升发汽灯店专营汽灯出租，为北海老街晚上的照明作过贡献；酒楼有珠海楼和茗珍居。其中珠海楼由北海富商集股经营，所建的酒楼为三层的钢筋水泥建筑，由于是民国初期北海最高的酒楼而名噪一时。昔日中华街的故衣铺最多，不下20间，因而有人称此街为“故衣街”。这些故衣铺的货源来自北海各当铺，它们把典当期满而不取的衣物拿去故衣铺卖，从中获取较高的利润。故衣铺每天早上开店很

有特色，老板们不约而同地用双手举起柜台上的算盘，摇动盘内的数十棵珠子发出连续不断的响声，先慢摇，然后逐渐加快和把算盘提高，当摇到盘珠子发出最密集的响声时突然停止，这时算盘上下层珠子会整齐地分开（即使用算盘时最初的静止状态），然后轻轻的把算盘放在柜台上。老板们就是通过摇算盘这一绝招祈祷当天生意兴隆。

中华街建成后，过了二三十年才兴建长 248 米的兴华街。此街的商业也很热闹，有荣兴福皮箱铺、高登科笔铺、雅趣酒楼、山货铺、白铁制品铺、鞋铺、杂货铺、染料铺以及当铺等多间，但以客栈最多，有天和栈、福和栈、祥和栈、全昌、成记、西和安、怡兴等多间，从灵山、武利、龙门、小江等山区肩挑果子、大米、竹织品来北海卖的小商贩到北海，大多入住这些小客栈，一些中介人在这里做提供买卖服务的“九八”生意。由于兴华街各式各样的店铺多，所以又称“店铺街”。

中华街和兴华街与最先建成的沙脊街同建在一条沙脊带上，而且这三条街依次首尾相连，成为北海早期最繁华的商业长街，后来北海人把这三条街统称叫沙脊街。

一个多世纪以来，北海几经沧桑，商业中心一再转移，沙脊街早已不是什么闹市了，只不过是一条老街而已。对比今天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新区，沙脊街更显得寂寂无闻了，只有遗留在街面的花岗岩石条，以及老街极少数店铺残存的招牌，是北海早期发展小商品经济鼎盛时期的历史见证，那时它繁华兴旺的景象，依然为“老北海”所津津乐道。

建在海滩上的“大街”

1984 年，国务院确定北海为全国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自此之后，到北海参观访问的中外专家学者络绎不绝。珠海路作为市区老街的代表性建筑，因受到众多来访者的关注和称赞而闻名遐迩。人们从其斑剥的临街立面，感受到它的沧桑岁月而称它为“百年老街”。其实就现在人们看到的珠海路，它的历史只有 70 多年，其前身的历史却比它还要长一些。此文是介绍珠海路的前身——

“大街”，一条真正建在海滩上的百年老街——而写。

大街建在北海第一街——沙脊街的北面，比沙脊街更靠近海。每当台风刮来，巨浪冲击海岸发出的浪花，飞溅到大街“下水铺”（本章有专文介绍）的后屋。大街和沙脊街一样，最先是从小沙桥头南岸，分别向东西两头兴建。

在道光至咸丰年间(1821 - 1861)最先兴建升平街，其路段从外沙桥至金鱼巷口，它可说是大街的中心。随后在升平街的东端建东安街（至今民生路口），在西端建大兴街（至今新兴路口）和西靖街（至今盐仓路）。宣统年间，大兴街因位于大街的西面而改名为大西街。

同治至光绪年间(1862-1908)，在东安街的东端兴建东华街（至今民权路口）。

宣统年间至民国初年，从东华街东端兴建东泰街（至今民族路口）和接龙桥（至今海关路）。

从道光初年至民国初年的百年间，北海的大街由上述7条小街组成。这些小街取名很有特点，除了以升平街为中心而有明确的“东”、“西”方向外，还表示了对“平安、吉祥”和“生意兴隆”的祈求。如每个街名不是有“平”、“安”、“靖”、“泰”等字，便有“兴”、“华”、“龙”等词，因而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商业特色。

建成后的大街，其街貌和沙脊街相似，没有骑楼，临街的立面全为一至两层的砖木（板）建筑，铺面有铺窗夏，街道全用花岗石条铺砌。每条小街的两端都有闸门（本章有专文介绍），以保晚上一街平安。所不同的是大街的街道比沙脊街宽一米余，长400多米而已。这是大街得名的原因。一位原居住在东泰街的90多岁的老人说，如果想了解当年的大街是什么样子，去看一下沙脊街就知道了。

据史料记载，1876年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英国驻北海的“领事署”“先租用民房办公”，“这间民房位于海滩一个斜坡的底部”。由此可知，大街建成后，英国驻北海的领事馆便设在大街的“下水铺”，是一座建立在海滩上的领事馆。

北海大街的码头——街渡口

约在清·道光初年(1821)始,北海沙脊街和大街(今珠海路的前身)相继建成以后,北海与廉州街(指合浦县城的众多老街)日渐加强商贸来往。那时没有公路,更没有汽车,从廉州街来北海做生意的客商(旧称“走水客”),除了走路外就是坐渡船。船开到北海后,在外沙东端内港南岸的一个码头(旧址在今珠海中92号西邻下面约50米处)停泊,乘客及随带的货物由此上岸直达大街。渡船停泊的这个码头,北海人称“街渡口”。

在北海大街的历史上,街渡口是一个有名的地方。不了解街渡口历史的人,以为街渡口的“街”,是北海大街的“街”,其实不然。街渡口的“街”,是廉州街的“街”,当时北海人称廉州为“街”。“街渡”即是廉州开往北海的客货混装的渡船。“口”是指客商和货物上落的码头。从廉州街开往北海的渡船,是从合浦簸箕屯附近一个名叫老哥渡的码头启航的。老哥渡至街渡口的航线,成为晚清廉州街与北海大街之间的海路通道。

1876年北海开埠以后,北海商贸日益发展,从北海进出的货物与日俱增,开往北海的渡船除了老哥渡以外,还逐渐增加从合浦县城周边开往北海的渡船,如乾体渡、党江渡、沙岗渡、西场渡、那丽渡,更远一点的还有钦州渡、安铺渡和东兴渡。这些渡船都是帆船,船舱装货,船面载客。载客人数视渡船的大小而定,约20至30人不等。从廉州街及更远一点的渡船,运来北海的大多是黄麻、青麻、生油、药材、蔬菜等北海居民生活用品和渔民生产的必需品;从西场、党江渡船运来的是家禽、生猪和盐。客商运回去的则是海味、洋纱及百货日用品。街渡口成为北海大街最为繁忙的码头。

笔者于二十世纪90年代初,在珠海中路92号西面墙脚下,发现一块高60厘米,宽50厘米的告示碑。此碑约300字,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绅商陈世珍等联名,向合浦县政府反映(有引号的为告示碑原文):“渡夫邓振武”“揽载霸撑滋事”,要求对他严肃处理,“以免再滋事端”。县政府为此对邓振武立案调查,并作了“判令将所换新照作为废纸”,并“勒石为记”等有关处理,日后

邓振武若再“揽载滋事”，必定“从重究惩决不宽贷”。此告示碑于当年六月廿四日立街渡口公布于众。人们从百多年前这块告示碑，可从侧面了解到街渡口昔日客货上落之频繁，于是出现了邓振武在街渡口欺行霸市的事件。

珠海路拓建成有骑楼的商业街后，合浦与北海之间往来不但有机动船，而且也有了汽车。抗日战争时期，公路被破坏，两地之间的帆船和机动船往来更为频繁。抗战胜利后，香港、越南的大批货物进出北海，其中不少货物也经街渡口上岸或下船。当时北海与香港之间，人们来往不用办签证等手续，出入非常方便，来往的客船都在街渡口码头上下岸。那一时期的珠海路真是“客似云来，货如轮转”，是这条商业大街的鼎盛时期，其中街渡口帮了不少忙。

解放初期，由于北海至合浦的汽车恢复营运，合浦及其周边到北海的渡船日渐减少，街渡口的作用随之消失。

二十世纪50年代末，北海在市区北岸筑海堤，昔日街渡口停泊渡船的码头不复存在。事过30余年后，原街渡口码头的东西面建了楼房，成了老街区的巷口，于是有好事者在街渡口旧址筑一门拱，拱顶用有图案的彩色碎瓷片堆砌“街渡巷口”四个字，一来把街渡口旧址作为老地名纪念，二来似乎在告诉过往的行人；尽管北海老街也有龙王庙码头、三王庙码头和三婆庙码头，但街渡口却是昔日北海的第一码头。

街渡口旧址南面，还有往昔防盗贼的闸门遗迹。那块光绪二十一年立的告示碑，当年被镶嵌在闸门东侧的墙脚下。百多年来，它历经1927年大街拓建的变迁和解放后街渡口闸门的被毁却幸存下来，成为昔日街渡口的历史见证。

老街的闸门

北海老街（指珠海路的前身“大街”，下同）的闸门，消失至今已有80年历史，只有年过80多岁，在北海土生土长的老北海才记得它的模样。这是一种古老的“安全门”，由高约3米，宽约3至4米的大门框，和十余根长2米多，直径15厘米左右的杉木条，（老北海叫“木栋柱”）组成。北海的老街如沙脊街和靠近海边的从东至西的东泰街、东华街、东安街、升平街、大兴街的两端都安

装闸门。此外，凡通往这些老街的各条小巷（又称“横巷”，宽1米左右）也有小闸门。这些大大小小的闸门早开晚关，犹如古代的城门。

北海的老街为什么安装闸门，这是因为北海自开埠以后，往来商船和移民日益增多。盗贼常在海上和街市抢劫。关于北海那时的治安情况，《北海关十年（1892-1901）报告》是这样记载的：“北海是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抢劫已成了遗传……。”除“令人讨厌的海盗抢劫外……更重大的是对大当铺的洗劫一空，以至抢劫由马六甲海峡一带或苏门答腊回来的移民……。”为防盗贼抢劫，各街区为保一方平安，各自都安装闸门，由各商号出资请更夫早晚负责开关。

那时的店铺在晚上是不做生意的，这是因治安和照明（当时只点小油灯）不好之故。每天晚上6至9时（视天气和治安好坏而定），便由各街的更夫上木栋柱关闸门，此后一般不再给人进出。更夫晚上约从10时起，提着方形镜灯，每隔两小时巡逻打更一次。到天亮鸡啼时（一般为早上6时），更夫打完最后一更（第五更），便逐条搬开闸门的木栋柱，恢复街道的正常通行，各间店铺也陆续开门做生意。

那时每间店铺门前的左面或右面，都有一个用砖砌成的高约90厘米，宽约120厘米，厚约33厘米的构筑物叫“铺窗鼎”，它们是老街铺面的一大特色。鼎脚侧面有一凹下去的小空间作“门官神位”，店主早晚为其敬香，祈求门神保佑平安。到了晚上关铺门以后，鼎上的大门离地面约一个人身高之处，有一个长约20厘米，宽约15厘米的小窗门，它有两个作用：一是晚上街坊有人来买少许货物时，可从此窗交货接银；二是防止盗贼借入铺买东西之机抢劫。铺窗鼎也有两个作用：一是顾客在鼎上的小窗门买东西时，可把买到的货物暂放在上面，以便腾出手来交接货款时数银；二是更夫晚上临时的睡床，在那儿休息易于监视街上的动静，一旦发现抢劫或火灾，即密锣紧鼓报警。各户的男士壮汉听到报警的锣鼓声后，便一起出来共同对付“突发事件”。更夫在那治安恶劣的年代，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治安员”的作用。

到了1927年，靠近海边的那一串长长的老街被拓建成现代商业大街，珠海

路加上那时北海已有了警察，治安有所好转，这些曾为北海老街安全作过重要贡献的闸门和更夫，从此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不复存在。

升平街有位“24孝”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是摆在首位的。孟子说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意为看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主要是看他是否尊敬父母。自古以来，我国有24位孝子的典型事迹，受到后人的称颂而千古流传。如“卖身葬父”，讲的是汉代人董永因家贫，父亲死后无钱安葬而卖身葬父；“扇枕温衾”，说的是汉代人黄香，9岁时母亲死后，他对父亲生活甚为关心，夏天给父亲扇凉枕席，冬天先以身温暖父亲的被褥；“闻雷泣墓”，记载的是晋代人王裒，他母亲生前很怕雷声，母亲死后葬于山林，每逢下雨打雷时，他便跑到墓前跪拜哭着说：“孩儿在此，母亲勿惧”，并终生这样做。上述只是24孝中的三个例子而已。

民国初年，北海升平街（今珠海西路中段）的一户（双铺户，为今珠海西路167、169号）人家的主人叫叶桂初，自小就没有了父母，由祖母抚养，他非常孝敬祖母。宣统三年（1911），其祖母死后葬于市郊冠头岭，他在坟旁搭一小棚，每天上午用一条小竹竿挑着一只内盛茶酒、香烛的小竹篮，步行约9公里路到祖母的坟前拜祭和守孝。他不但天天、月月如此，而且年年如此，风雨无阻，连守三年。他的孝道在当时北海老街中被传为佳话，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孝子，因此，街坊邻里不约而同给他起了一个雅号——“24孝”，与我国古代著名的“24孝”有着同样的美誉。就这样，叶桂初成了北海老街尽人皆知的孝子。

叶桂初知名度高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肯为家乡做好事，并得到当局和学校大张旗鼓的褒扬。他靠在家里办私塾为生，业余喜欢习武和用中草药给群众医治铁打刀伤。他除了在其宅地的后院种草药外，还经常出野外采药，为群众治病，对穷苦病人则施医赠药，故其助人为乐的口碑很好，成为小有名气的中草药医生。

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的篮足球队每次出外参加比赛时，叶桂初便背着药箱，主动前往为在比赛中受伤的队员进行及时包扎和治疗。他的义举深受一中师生的称赞，学校赠一大横匾给他，由学生抬着，请民间乐队随学生队伍奏乐，把

横匾送到他家，以表彰他对家乡体育运动的关心和支持。这使叶桂初一次又一次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时至现在，叶桂初早已逝去，其旧址也早已易主，但后院还在，地上的杂草，似乎还散发出昔日草药的芳香。许多老北海早已忘记叶桂初这个名字了，但一提起“24孝”，他们都说有这个人，并能说出他的故事。

叶桂初的孝道，被收集在《合浦县志》（民国版《人物志》中的《乡贤》编），成为载入史册的珠乡名人。

珠海路是怎样建成的

北海的珠海路以其历史悠久及房屋建筑风格的特殊，20世纪80至90年代备受中外专家、学者、政要的关注。该路建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它的建成与当时北海建制的升格有关，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以前，北海属广东合浦县靖海区管辖，属乡镇级编制。同年，广东省政府在佛山、陈村、北海、梅菪等6个乡镇级的商埠，先后设立市政筹备处，直属广东省管辖。北海于1926年3月被正式批准成立“北海独立市市政筹备处”（下简称市政处），设总务、公安、教育、卫生、财政、工务五科，脱离合浦县。

市政处为了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改造除沙脊街外的大部分主要的大街小巷，重点是后街（今中山路的前称）和大街（今珠海路的前称。本文专写大街被改造成珠海路的过程）。

当年的大街从西至东，分别有大西街、升平街、东安街、东泰街和接龙桥。其中以东泰街和东华街“多殷商富户”，筹款建街较易。市政处于1927年6月起，首先拆除这两街，按规划拓建，历时一年完成。

此时的北海，因各种原因，商业一度衰落。主要原因是广州湾（今湛江市）为法国租借地，“货物入口，向不课税”，致使一向到北海采购货物的安铺、石城、壶洞等地的商人，全部到广州湾购货，造成北海商业冷淡。为此，广东南区善后委员陈铭枢，为了减轻北海经济负担，向广东省政府呈文请求“裁撤北海、梅菪

两市，改为警局”。理由是“北海地方，原非殷富，近年市内商务，内因金融混乱，外受广州湾影响，益形衰落，商人营业，十九亏损，民困若此，何堪加重负担……现计市年收入，月亏数百元，维持原状，尚虞不足，有何余力从事建设之可能，较不如取消市制，归并县治，以轻地方负担……”（摘自1928年11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南区请裁撤北海梅菪两市改警局》）广东省政府根据陈铭枢的“呈请”，于1928年11月裁撤北海市政处，“行政归并县治警局”，“设公安工程二科”，以缩减机构，使经济复苏。

其实，市政处被撤销，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与当时市政处一些主要的官员腐败和不作为不无关系。如首任市政处专员陈春熙于1926年3月上任仅10个月，便因“贪赃枉法、劣迹昭彰”而引起北海万人示威游行，并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陈春熙”的口号，同时电请上级机关将陈撤职。陈于年底向省政府提出辞呈，最后倒台。

1927年1月初，接任的周昌荫专员，“因故未曾到任”，由当时驻北海的第十一师部副官林时清代行专员职权。不久周昌荫专员终于到任了，却在当年4月27日因贪污受贿被市民弹劾去职。

当年7月9日，省政府任命廖国彦任市政处专员。

北海市政处成立仅两年多，先后共4位专员走马上任，其中有2位却是贪官污吏，这就很难扭转北海经济的被动局面了。

市政处撤销后，由警察局行使原市政处的职权。1928年底，对东安街、升平街、大西街和接龙桥进行拓建。这时出现了一些商铺的建筑违章，偷工减料，不按原总体规划的要求建造，使临街铺面建筑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危房，于是警察局及时张贴《查禁违章私擅建筑》的布告，称“市区范围建筑铺面，例须绘图呈报，发给执照悬挂门前，方准施工……倘敢仍然玩视，故违定章，一经查觉，定必严加处罚……。”由于警察局查禁得力，于1930年底使大街后来的拓建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拓建后的大街，接龙桥、东泰街改称珠海东路；东华街改称珠海中路；东安

街、升平街和大西街改称珠海西路。

市政处裁撤后，北海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据王洗编著的《中国海港志》记载，民国十八至二十六年(1929-1937)间，北海港的贸易以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最盛。全年进出口船只共 566 艘，共计 669096 吨，贸易总值为 3370000 元。对外贸易与越南最为密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进出口海轮 429 艘，计 431728 吨。另河内船 192 艘，计 38208 吨。

市政处成立不到三年便被撤销了。当年北海被升格为独立市就像昙花一现。尽管这样，珠海路作为那段暂短岁月的产物，却成为北海老街的代表性建筑。人们游览在这条历经沧桑的老街，还能感受到它昔日的美丽和曾有过的兴旺。

珠海路的商业鼎盛时期

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我国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个时期，是珠海路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珠海东、中、西各路的经营各有特色，且经营方式多样，出现了不少有名的商号和商界的名人。

珠海东路的店铺以经营咸鱼和海味为主，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咸鱼街或海味街；珠海中路则以经营苏州、杭州的绸缎布匹而闻名，所以有“苏杭街”的美称；珠海西路因接近外沙和外沙港口，是渔民上岸购买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的必经之路，所以该路以经营木材（造船和建渔家棚用）和渔船生产用具为多。

当时的珠海路，不少商号经营一种叫“放船头”的业务。所谓放船头即是某渔船的生产资金有困难时，某商号予以贷款（不收利息），但借款的渔船打鱼回来后，必须以低于市面的价格把鱼卖给曾予贷款的商号。这种借贷方式对当时的渔业生产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珠海东路经营放船头的有名商号有泗盛、生泰、金源、罗合丰、福合、源昌、金记栈等十多家，以及海味铺焕生庄、世泰、益生、祥合泰、杨顺记、悦丰等十多家。

此外，一种名为“九八”行的业务也很有特色。所谓“九八”，即我介绍你做成一笔买卖，我可从中提取成交额的百分之二作为佣金，你得百分之九十八。人们把这种业务叫“九八”生意，它对沟通市场信息和活跃市场经济起着积极的

作用。珠海路，较有名的“九八行”有广万和、钜兴祥、荣昌泰、生泰等数间。

代理洋行及进出口业务是珠海路商业经济的一大支柱，如公元泰、广昌和、今升祥、和生泰商号分别代理法国、英国、日本和香港的洋行；美孚（美国）、德士古（德国）、亚细亚（英国）的火水油均由明光、贞泰、生昌、合益等商号经营。进出口商有生泰栈、桓和隆、万成庄、广泰祥、亨泰、广记等二十多家。这些代理洋行的设立和进出口业务的开设，是北海近代对外贸易的见证。

与进出口航运业务相适应的驳船业，以龙绍棠和许爱远经营的驳船最为有名。

珠海中路有苏杭街之称，孔怡记、广记、昆仑、东华公司、人和兴及联茂等，是苏杭街的名铺。此外，卖土杂货的贞泰、亨泰、生昌、广珍祥，以及卖药材的广瑞祥、永顺和、永祯祥、兆生祥等铺也很有名气。此街的茂和书店，是民国期间北海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书店。

珠海西路较有名的商行有胜隆、和生、广泰祥、永泰、均隆等数间。其中均隆以其经营的殷实、重视信誉而名扬北海商界。

在珠海路众多的商界中，有四人是商界的名人，他们是：生泰的陈鸣东、荣昌泰的吴栋南、罗仁裕的罗振东以及广昌和的梁戴三。他们在商场中以精明能干、足智多谋著称，被誉为北海商界的“四大天王”。

20世纪20年代末，苏杭街的东华公司门前贴一副对联：“选办环球货品；经营世界匹头”，人们从中可看到商业家们在经营上的气魄和胆略。这些名噪一时的商号及商界的佼佼者，在这样1.5公里长的珠海路，开创了当时北海商业的鼎盛时期，为北海商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濒临大海的“下水铺”

北海的珠海路（包括其前身“大街”）是一条老街，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它是北海市的商业中心，曾有过商业的鼎盛时期。这条离海边只有七八十米的老街东西走向，与北面的海岸线平行，街道两边的铺面南北相望。北面铺的屋后临海，为防止船艇碰撞房屋，屋后都安放防撞木桩。每到涨潮，海浪拍击屋

后的墙壁便溅起雪白的浪花。由于北面铺的屋后与大海相接，所以珠海路的商人便给它起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代名词“下水铺”。“下水”除了与“北面”同样具有方向性外，“下”是表示北面铺的地势位于低处（珠海路的地势南高北低）；“水”字的含义更广，它除了表示这些店铺靠近海（水）之外，还有旧指银子的成色，转为货币兑换补贴金及汇费之意，如“汇水”、“贴水”等。所以说，下水铺的名称既形象地反映了珠海路的地理形势，又有地方商业特色。

由于下水铺的地理位置特殊，使其具有做生意非常优越的条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下水铺屋前骑楼顶端的面壁和屋后的顶墙都可标示商号的招牌，街上和海上都可分别看到。二，下水铺的房屋长达四五十米，屋前为做生意的铺头，屋中为仓库，屋后临海，可泊船艇，这是集经营、仓库、码头于一体的经商之地。三，从海上开来的货船，潮涨时可直接泊到货主屋后的码头装卸，这样可省去不少运输费和时间，也方便一些商人走私。四，由于下水铺向南，在炎热的夏天，屋内能享受到凉风习习的南风。屋内的小天井可安装简易手摇管井，供应日常生活用水。厕所则设在屋后伸出海面的地方，既清洁凉爽又别有情趣。由于上述优越条件，尽管下水铺的屋价或租金较昂，但商人们还是争着购买或租用。珠海路进出口商的铺头和有名的商号，大都位于下水铺。

珠海路的北面铺被称为下水铺，那么它的南面铺很自然地被称为“上水铺”了。由于上、下水铺的名称能反映街道两侧的方向，所以北海人习惯把旧市区的沙脊街和中山路的南、北面的店铺分别称为上、下水铺。

老街“辟邪”习俗

北海的珠海路是一条很有特色的百年老街。前些时候，一位朋友对我说，珠海东路120号东邻巷口，有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小石碑，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旧时人们用来“辟邪”的。后来我到那儿一看确有此碑，却是近几年立的。早在10多年前我参加北海的文物普查期间，好几位老北海曾说过，珠海路“下水铺”的一些巷口都立有这样的石碑。当时，我只知这是一种辟邪习俗，至于“泰山石敢当”几个字的来历及其内容，却未曾过问，偶然谈起也很少有人说

得清楚。

查阅典籍，知道在唐朝，我国有些村落巷口，都有立“石敢当”石碑辟邪的习俗。古人把使人畜致病和害人的“妖魔鬼怪”等东西统称为“邪”。辟邪就是驱除邪祟，当时人们的做法因地制宜，如居住在山上的人，“宜养白犬、白鸡，可以辟邪”（李石的《续博物志》）；对于村民居住的“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继古丛编》）。后来山东一带的人们因其境内有著名的泰山，故在“石敢当”之上加“泰山”二字。一来“泰”有“否极泰来”、“国泰民安”之意；二来认为泰山很威武，只要有“泰山石敢当”碑石的地方，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敢来捣乱，因泰山是“石敢当”的后台。就这样，这一辟邪习俗便风靡华夏大地，故北海开埠后，老街的一些正门或巷口，也立“泰山石敢当”碑石，成为老街建筑的组成部份。我以为这些碑石在“文革”中破“四旧”时已荡然无存，却想不到于近日写此文期间，在民建一街35号西墙临街的墙脚还偶然发现一块，字迹虽然大部份被损毁，但“石敢”二字还能清楚地显示出来。这块立于北海市区最古老街道的碑石，也许是仅存的一块了。

此外，在北海的老街中，还有用“太极八卦图”来辟邪的。该图的中心是“太极”，其外围是“八卦”。在《汤·系辞上》解释：“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并认为“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原。孙中山先生用近代科学观点，对太极与物质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诠释。所以说，太极八卦图是中华民族古老灿烂文化的一部份。后来由于道教的影响，以及一些人利用该图作为占卜的工具，因而民间相信它能驱邪避难，故在家庭的门头或屋梁上都绘制太极八卦图。今珠海东路5、7、9号三间临街墙面的上方（见题图）都塑有该图（直径约60厘米），是反映北海老街辟邪习俗的代表建筑。

珠海路老街的建筑具有中西建筑糅合的特色，然而“泰山石敢当”碑石和“太极八卦图”等辟邪物在老街建筑的出现，更使珠海路的建筑具有鲜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个性特色。

珠海路的管井

珠海路在拓建前由多条老街连接组成，这些老街虽然只有4米余宽，却是当时北海马路最宽的街道，故通称“大街”。但这条大街却没有水井，居民必须到位于今中山路（当时叫牛车路）一带的水井担水吃。也许是这一重要原因，珠海路“上水铺”有多条小巷通往沙脊街，沙脊街又有多条小巷通往牛车路。这些小巷既是人行道，也是担水道，而且后者的作用更为重要，故老北海也通称这些小巷为“担水巷”。由于珠海路的居民担水路程较远，有些店铺或家庭没有人担水的，便请人担水，这样便有了担水卖的一些个体劳动者。

1952年，为了解决一些街区市民用水的困难，市政当局拨专款建北海市自来水厂，并在牛车路西面叫鸡行的地方打了四口大井（井址在今市中医院内）作为供水井，后因故没有建成。珠海路拓建后，于1928年由北海市商会牵头，各商户捐资，从外地请专业打井队到珠海路打管井，从珠海东西段（原东泰街）至珠海西路东段（原升平街）近800米路段马路的边缘，每隔约80米便有一口管井。这种管井是一种管泵与杠杆的简易联合装置，只需在地下打入一根数米深的，直径约10厘米的铁管（吸水用）和安放一个支架，再用一木制杠杆把铁管内的吸水管和支架连接起来便可构成。这一口管井极大地解决居民日常生活用水。打水时，打水人手握杠杆末端上下起动，水便从管嘴流出。这种打水装置不但投资少，而且安全、卫生，一天24小时随时可打水，也不用交水费，打出来的水非常清澈，其透明度可与现在的矿泉水相比。

这8口管井安装以后，市民非常高兴。对于珠海路的居民来说，不用再穿街过巷去担水了，也大大地减轻了其它水井数十年来人多打水的压力。每天黄昏（每天在这个时候打水的人较多），珠海路各店铺的工人以及担水卖的人都到较近的管井去排队打水。那有节奏的流水声和一双双水桶挪动的碰撞声，犹如珠海路的“黄昏交响曲”；而那些从海里游泳上岸的小孩们，则趁没有人打水的空隙，互相赶忙打水，让那清凉的泉水把身上的海水冲得一干二净，这又构成了珠海路一幅特有的风情小景。

1959年珠海路安装了自来水，约在六十年代中期，管井从此结束了它长达30多年的历史使命。

珠海路，近现代建筑的年鉴

在北海旧市区，有一条路引起不少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和重视，这条路就是珠海路，代表着北海旧市区的城市建筑风格。它的形成可上溯到19世纪80年代，与西方建筑传入北海以及北海的广府商人对骑楼建筑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

1876年，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西方的券廊式建筑逐渐传入北海；1926年北海作为广东的商埠准备升格为独立市，在北海经商的广府商人把广州商居两用的岭南骑楼建筑也“搬”到北海来。这些中外建筑艺术，通过富有想象力的北海建筑规划师和具有创新精神的本地建筑工匠，把貌似沙脊街（北海早的老街）的大街，改造成中西建筑风格揉合的商业大街——珠海路，此路因具有这一建筑特色而闻名遐迩。

珠海路的建筑特色，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具有西欧特色的临街窗户

珠海路二楼以上的临街窗户用的全是百页窗门。窗顶则采用砖砌的一圆心拱或二圆心拱。窗拱底部，全用太阳纹图案装饰。据说太阳纹图案（属几何形式）的产生，最初来自古埃及人对太阳神的崇拜。以后这种放射状的纹饰，在欧洲的建筑中被普遍应用在窗拱或门拱的底部。窗拱外沿有雕饰线，支持拱券墙体的是方形柱子，柱子的顶端也有雕饰线（又称“线脚”），它位于拱券末端与柱子顶端的连接处，起着既分隔又联系的过渡衔接作用。这些雕饰线工艺精美，线条流畅，使本来平板的墙面满墙生辉。墙体的结构层次清楚，曲直线条富于变化，颇具立体感，因而具有较强的艺术效果，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二、临街的“空中雕饰长廊”

珠海路临街的女儿墙，都有不同风格与特色的雕饰。它们主要是出自中国本土上的，也有来自西方的。但更多的是中西方雕饰的融合，形成长达一公里半的两条“空中雕塑长廊”，其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三、具有岭南特色的骑楼建筑

珠海路临街的“骑楼”高4米，宽3米，是这条路的建筑特色之一。它不但让铺面往外延伸，也使该路向两侧扩展，人们在骑楼下行走，既便于观赏、购物，又可挡风、避雨、遮阳。骑楼的柱子粗重厚大，颇有古罗马柱头的风格。

四、洁白典雅的临街墙面

珠海路临街的墙面（包括建筑的内外墙），全部用白色的纸筋灰批抹，使整个建筑群呈现洁白典雅的情调。犹如北部湾畔的一串明珠，在太阳光下发发出夺目的光彩。

五、专供书写商号的临街墙面

珠海路临街二楼窗台的墙面和骑楼的柱头的立面，是专供各商铺书写各自商号招牌使用。其中不少招牌的书写是出自本地或广府著名书法家之手，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当你在街上游览，那些名目繁多的大招牌，犹如商铺里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充分显示骑楼建筑具有优越的使用价值。

珠海路的建筑因有统一的建筑基调，以及具有西方建筑的韵味和我国南方骑楼建筑的特色，成为北海近现代的建筑年鉴。

作家舒乙对珠海路的妙喻

舒乙是我国著名的作家。1996年5月底，他和曾敏之、陈建功、蒋子龙等11位作家应邀到北海参加由市政协主办，市委宣传部、北海日报社等六单位协办的“京津港文化名人笔会”。会议期间，作家们参观了珠海路。这条具有中西合璧情调的老街使作家们感到惊奇，他们认为这是一条很有历史价值的老街，是北海不可多得的一个旅游参观点。在一次座谈会上，舒乙代表作家们向有关负责人提出了保护珠海路的建议。

舒乙回到北京后，于6月中旬写了一篇题为《连接北海和新加坡的脐带》的文章，它开头是这样写的：“北海有一只金饭碗，绝对是一件宝。这只金饭碗，是一条街。这条街叫珠海路，是条老街，保存得相当不错。老街怎么是金饭碗？为什么？”接着，作者谈了对珠海路的一系列感受，因为他来北海之前曾到新加

坡考察。这次他参观珠海路时使他“大吃一惊”：“这条老街竟然和新加坡的老街一模一样”。作者的父亲是我国已故的著名作家老舍，老舍先生于1928年前在新加坡教书期间写了一部以新加坡为地理背景的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小坡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因生在新加坡早期开发时，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人建的一条叫小坡的街而得名。“整条街全是二层小楼，结构完全一样，一律有‘骑楼’，行人道可避风遮阳。二楼的窗户是券拱结构，相当漂亮，房外面一律抹灰，色泽淡雅。”这条街的“房子成了新加坡的标志和骄傲，也是它的古董”。作者因而感叹：“在新加坡被视为国宝的老房子居然和珠海路一模一样”，“其样式同出一辙”。作者认为：“北海原属广东，北海在历史上是广东人建造的。北海和新加坡是地道的双胞胎，像磕模子一样……这使北海和新加坡之间有了一条脐带。”

在旧中国，华侨在异国深受歧视。今天祖国强大了，并进行改革和开放，广大华侨和侨裔“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都“义无反顾地返回投资”，其投资额占“海外投资的70%”，“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新加坡和北海都靠海，其历史的发展又是如此的相近，两者有着“共同的根”，由此作者得出“合理的结论是：北海到新加坡去招商，必能获得大的成功……为此，要作许多文章，比如请祖籍广东的新加坡人组成访问团访问北海……派北海的招商团访问新加坡”等一系列互访活动，“就会把连接北海和新加坡的脐带保住，仿佛是有了根，就会形成有北海特色的快速发展”。

作者最后说：“将珠海路比作金饭碗，是形容它的价值，保住它，就宛如保护一只金饭碗，能给北海带来巨大的财富”。

专家学者眼中的珠海路

在一次市政府召开的文物保护会议上，一位副市长曾说，珠海路是一条很有特点的路，第一次来北海参观的朋友，都带他们去参观，看了以后他们便大致对北海的历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0年前，北京的一些建筑专家考察珠海路后，曾提出建议——日后若改造珠海路，骑楼和临街的建筑应保持原貌。

1994年7月，北京市古建筑研究院院长王世仁应邀到北海参加“北海国际文化艺术城”的方案设计，他参观珠海路时感慨万分地说，这条路不但很有特点，而且保留得这么好。新加坡也有这么一条街，但没有北海的珠海路这么长和具有文物的特点。王院长建议，应按照文物的修复原则去恢复其原貌，使它成为文化旅游一条街，这在中国也是一绝。

1996年5月，在一次北海旅游宣传座谈会上，香格里拉的法籍容总经理说，北海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珠海路，它很像新加坡一条著名的老街。新加坡在过去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中，曾把许多有历史价值的老街拆掉，后来想到开发旅游业时才感到后悔。希望北海市政府能重视这条老街的保护。

此外，我国著名作家舒乙，美籍华人学者孙洁，英国建筑专家白瑞德，他们参观珠海路后，对20世纪20年代珠海路建筑的成就及历史价值均作了高度的评价。

如果说上述中外各界人士对珠海路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评价是“英雄所见略同”的话，那么1997年12月29日到北海访问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市长皮埃尔·布尔克（下简称布市长）参观珠海路后，把珠海路的价值一下子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建议“北海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珠海路老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保护”（下简称“申遗保护”）。布市长的建议着实让北海人感到惊奇。

据有关资料介绍，布尔克作为加拿大第二大城市的市长，阅历丰富。他主政期间，对旧城蒙特利尔的修复、开发和利用十分重视，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使该市成为一个观光旅游城而带来财富，该市因此引以为骄傲。布市长参观了珠海路之后很自然的回忆起修复前的蒙特利尔旧城。在他看来，珠海路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有利条件，故向北海建议“申遗保护”。

笔者认为，布市长对北海的建议是一回事，而我们北海能否“申遗保护”又是另一回事。因为“申遗保护”是有评审标准的，主要有如下三点：一、申报项目的自身价值，其中的一条评审标准是：“可作为一种类型建筑群或景观的杰作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的作品。”此外，还要有“当

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保护该遗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以及“该遗产项目环境的协调及对不协调状况的克服程度”，这是评审标准的第二、三点要求。说具体一点，北海的珠海路要想“申遗保护”，必须做许多工作，首先一条，市政府需要投入资金，对珠海路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才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克服珠海路环境的不协调状况。用作家舒乙的话来说，就是“将珠海路面貌正在发生破坏性变化的趋势扼制下来”，以确保其真实性。

美籍学者孙洁谈珠海路

1993年9月初，一个偶然的机，我认识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孙洁女士（台湾省人），她曾在海外多所高等学府受过教育，现在是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先后到过欧美和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观赏了许多大都市的风光，游览了不少名胜古迹。她谈吐文雅，富于想象和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她第一次到北海便被珠海路的风物所吸引。下面是孙洁女士谈参观珠海路的感受：

“我来北海之前看了一些有关北海的资料，对北海有了初步了解。到了北海经过实地观察，我认为北海是一个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都很好的地方，尤其是珠海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象发现了新的文化古迹，吸引我去观察它，了解它。我想不到北海有这么一条很有特色的长街。”

在谈到珠海路的印象时，孙洁女士说了这么几点：一、珠海路临街两边除了有高大的骑楼外，墙面的窗柱、窗拱雕饰线以及墙顶上造型各不相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雕饰非常美，很有艺术特色。为此，我拍了不少照片留念；二、我到过云南大理，那里的建筑物全是白色的，珠海路的建筑物也全是白色的，尽管多年没有粉刷，但不难看出它“年轻”时洁白迷人的风韵；三、我发现珠海路东头有几口水井，其中有一处是双口水井，对珠海路来说，它是一处古迹，这无形中把珠海路的历史往前推到更为遥远的年代。

另外，我还发现了罕有的小巷，那就是珠海路与沙脊街之间南北相通的小巷。台湾东部有一个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小巷，当地人叫“摸乳巷”。巷名不太文雅，它是指女性在这些小巷相对而行时，相互只能擦胸而过，是对小巷窄小程度

的形容而已。当我走进这些小巷时，感觉它很长，就象它的历史一样悠长，像走在一条被人遗忘的，古老而幽深的小道上。

有一天，我站在珠海中路朝东西两头遥看，却望不到尽头，那时候我才发现珠海路气势不凡，很象一条龙，龙头在海关，龙尾在外沙。我这样形容是浪漫了一点，我的意思是说珠海路是个好地方，尽管整条街现在的墙面斑驳，行人稀少，但不难看出它曾有过商业繁荣的历史时期。

谈话中，笔者向孙洁女士提了一个问题：银滩现在已成为我们北海的骄傲，如果把银滩和珠海路相比，您更喜欢哪个？

孙洁女士说：“北海银滩的确很美，坦率地说，作为海滨旅游区，大陆有很多，台湾有很多，国外就更多，但像珠海路这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有独特民俗风情的商业老街给我印象是如此之深，从这一点来说，我更喜爱珠海路。不过，我发现珠海路有些新建的房子，墙面全部贴上瓷板，如果所有重建的房子都这样，那么珠海路的风貌将大为逊色，我这样说，不是反对把旧房子拆倒重建，而是重建时应保留临街墙面的原貌。……”

谈话结束时孙洁女士说，希望北海保护好珠海路。

珠海路何日风采依旧

20世纪最后10年间，北海珠海路的历史价值和建筑风格，受到不少中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称赞；21世纪的头几年，珠海路开始受到土生土长的北海人的重视和关心。前些日子，苏姓女作家以她优美的散文《老街，老街》在《北海日报》发表，把老街珠海路的“骑楼像客栈一样收留了我们，正如小城曾收留过我的童年和青春”的经历，作了美好而又甜蜜的回忆；而一位严记者则在“关注珠海路”的专栏中呼吁：“珠海路的修复改造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选择，国内外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尊重原貌，保护根脉”。这两位年轻的北海妹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老街的情感和关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其实，北海老街的保护，近几年来，北海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近代建筑物及建筑群，如有一定的保护价值”，按“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要求，

在规划上做了许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传统风貌”的工作。如2000年6月，派出专家组到加拿大蒙特利尔考察后写了考察报告，介绍国外保护老城的先进经验；2000年8月，编制了《北海市珠海路、中山路历史建筑档案》，为老城区修旧如旧的保护建立资料库；2001年9月，邀请同济大学风景旅游系与北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北海市旧城区保护与旅游规划》；2001年10月17日，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蒋大卫教授等11位我国顶级的专家，对《北海市老城区旅游与保护规划》进行了评审。此外，还邀请老街的群众代表参加保护老城区的各种座谈会，倾听群众意见。尽管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为老街的保护做了许多工作，但老街的面貌还不断发生破坏性的变化。《北海日报》梁记者于2004年8月19日发表《百年老街在受折磨》，文中说“被专家学者们誉为‘近现代建筑的年鉴’和‘凝固的音乐’的老街，因各种原因，现在却正在遭到破坏”。不少老北海说，珠海路现在已成为一条衰落的老街、寂寞的老街、被遗忘了的老街。使每一位关心老街的人甚感痛惜。

对老城区骑楼建筑的保护，中外的一些城市都有值得借鉴的经验。笔者于数年前在中央电视新闻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新加坡一条两层的骑楼老街被拆除，却保留临街的立面建筑，前后被多条长木条支撑着作临时性的保护，待重建时把后面新建的房屋与前面的原立面建成一体，做到保护临街原立面的真实性。新加坡把这些老街（如牛车水）改造后定为“国保”，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而吸引众多的外国游客。

《广西日报》在今年11月12日第11版的头条，以半版的大篇幅刊登黄金献撰写的《骑楼城：一百年的活色生香》的老城区改造的报道。文中把梧州市的“印象中的骑楼街，不过是消失在历史中的那个繁华城市留下的破败残骸”。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本着修旧如旧、充分保留和再现梧州骑楼建筑风格的原则”，建成一个“活色生香的骑楼城”。看完这篇报导，笔者发现梧州与北海在近代对外开放都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而两地的骑楼建筑“与新加坡牛车水，广州上、下九路一带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总长7公里的梧州城区百年之后却变得如

此活色生香。而我们北海总长不到 3 公里的骑楼老街还如此破败。北海是我国沿海对外开放的 14 个城市之一，珠海路的临街立面建筑，无一不打上近代对外开放的烙印，比之中外的骑楼建筑更具有文物的特点。遗憾的是，近年来，北海老街不断遭到破坏性的改变，这与对外开放的城市形象是很不相称的。